

廖仲愷年譜

陳福霖 | 美 | 余炎光 / 著



湖南出版社

廖仲愷年譜

邓颖超

●陈福霖〔美〕 余炎光／著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廖 仲 恺 年 谱

〔美〕陈福霖 著
余 炎 光

责任编辑：徐日晖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插页：5

字数：380000 印数：1—1600

ISBN 7—5438—0170—1

精装：

K·26

定价：8.60元

序

近几年，我在很多场合谈到过，要使孙中山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就必须加强对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研究。在这些人物当中，廖仲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革命二十二年，由一个同盟会的普通干部，成为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核心人物、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好朋友。廖仲恺是如何走过这段艰难而光辉的历程的？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陈福霖、余炎光两位教授，是国内外学术界知名的研究廖仲恺的专家。我与余教授早就相熟，陈教授则是在八十年代初认识的。他们研究廖仲恺的成果，对我研究孙中山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也使我们对研究廖仲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4年，由于陈福霖教授的努力，廖仲恺研究成为当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之一，我与余炎光教授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廖仲恺研究进一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在这个时期，陈福霖、余炎光两位教授决定合作编撰《廖仲恺年谱》。他们两位积多年研究的心得，合力从事这项工作是十分合适的。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他们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收集、整理了丰富的资料，为年谱的编撰作了充分的准备，1987年初，余炎光教授去陈福霖教授所在的美国迈阿密大学访问，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写出了《廖仲恺年谱》的稿本，并要我为这个年谱写一些话。我早就期待着一部有分量、有水平的廖仲恺年谱的问世，因此，十分愿意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谈谈自己的感想。

我这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孙中山。从《年谱》稿本中，我感到，编撰者十分重视谱主与孙中山的关系。孙中山与廖

仲恺的特殊的亲密关系，是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同志、战友和助手。1903年，廖仲恺即接受孙中山的委托进行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与孙中山关系日益密切，从1912年廖仲恺在广东推行孙中山主张的“单税法”，直到1924年孙中山北上，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从多方面努力实施孙中山的政策，其间碰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廖仲恺年谱》作了如实的反映。特别应该肯定的是，它纠正了海内外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著述中的若干失误，同时又增补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因此，仅就推动孙中山研究这一点来看，《廖仲恺年谱》的出版就已经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我的第二个感想是，这本年谱的资料丰富而翔实，编撰者在史料考订上确实下了功夫。从《年谱》看，很多资料目前当然是常见的，但也有不少是我们过去所没有见过的，或者根本没有办法见到的。由于陈福霖教授是在美国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交游广阔，有机会接触和收集保存在香港、台湾、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档案、文献；而余炎光教授则在收集国内资料方面，长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与尚明轩同志合编《双清文集》。陈、余两教授的合作，在资料来源方面拥有一般中外学者难以具备的有利条件。因为资料丰富，《廖仲恺年谱》对谱主的思想 and 活动的记述就显得十分丰满。过去一些不很清楚的问题，经编撰者努力，一一弄清楚了。例如，以往我们对《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国民党党章、党纲草案公开发表的确切日期不能肯定，《廖仲恺年谱》根据台湾收藏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指出上项文件是在1923年11月11日的广州市党员大会上首次以传单的形式印发。这样，我们对国民党“一大”筹备经过了解就更具体、细致了。《年谱》的编撰者对史料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一般说来，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等人的回忆，应该是研究廖仲恺的权威性史料，但《年谱》引用这些史料时仍十分注意考订，订正了回忆录中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对某些研究廖仲恺的

著作由于考订不精而产生的失误,《年谱》中逐一指出;对一些流传相当广泛的错误史实,更是在细致考订的基础上加以订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廖仲恺年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对谱主的活动及其思想是这样,对其他人物也是这样。这部年谱在行文中虽然没有花费很多文字对谱主进行评论,但它以丰富的史料,如实地反映了谱主的一生,本身就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要对历史人物做到褒贬得宜、不苛求、不溢美、不隐讳,是颇为不易的,正因为如此,我更感到两位编撰者的努力的可贵。

总的来说,《廖仲恺年谱》是近年海内外史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一项可喜的成果,它的问世,是编撰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的研究的重要贡献。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料,不同形式的中外学术合作研究将会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考虑和接受。我恳切期望,陈、余两位教授在今后的合作研究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陈锡祺 于中山大学

1987年10月

序

两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位侨居美国，另一位则在广州执教）共同撰写了这部《廖仲恺年谱》。这是一个十分适当的安排，因为廖仲恺在美国诞生和长大，而成年后却在中国及其毗邻地区从事革命斗争；陈福霖教授曾在香港和美国攻读，而余炎光教授则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和从事科研。两位学者分别在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美国和日本从事研究廖仲恺的革命伟绩，历时二十余载。现在，他俩把研究成果综合起来，阐幽发微，厘订讹讹，撰写了这部《廖仲恺年谱》。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的一本学术价值很高、史料翔实的著作。

撰写名人传记，首先要根据信而有征的史实和不抱任何成见所秉笔直书的年谱，这是撰写历史著作的通例。或者说，年谱是撰写历史著作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一种扎实的基础功夫。年谱把谱主的一生重要事迹，按年、月、日顺序清晰地排列出来，并将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摘要勾玄地加以陪衬铺叙，这就使谱主在历史活动中的社会背景和个人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易于理解。虽然有许多史料散佚失传，但是，通过严密的对比研究，历史学家仍然可以去伪存真，自持一说，使谱主的毕生功业活生生地重现出来。对于不同的、甚至充满矛盾的史料，历史学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尖锐洞察力和深湛的学识修养，适当取舍，作出判断。

年谱是一种客观的、准确的史事纪录，而不是去分析历史本身。它可以容许倾向性，阐释各种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如何影响谱主一生的事业，但并不一定要去分析和比较这些因素孰轻孰重。一本评述议论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当然，作者对每一史料的取舍，都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在此，要完全摆脱主观选择的色彩，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陈教授和余教授对廖仲恺的研究可说是造诣极深的。他们两人曾分别在中外的史库中查阅了各种档案和第一手的史料，熟练了廖仲恺和他的亲密同志的著作，遍访了廖仲恺的家属和亲友，还到过廖仲恺的家乡和革命活动所在地从事实地考察，更曾多次撰写了有关廖仲恺的学术论文。他们两人决定合作撰写《廖仲恺年谱》以后，更以半年时间在美国迈阿密大学进行了商讨和琢磨。这种严谨的研究态度，我认为是值得欣羡和提倡的。

廖仲恺是一位爱国的华侨革命家，又是一位熟谙中日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二十年代国民党的改组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他继承遗志，一往无前，最后饮弹殉志。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廖仲恺是最受尊崇的少数革命家之一。我谨以至诚，向中外读者推荐这本《廖仲恺年谱》。

韦慕廷 (C.Martin Wilbur)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序

一本详尽的廖仲恺传记，早就应该出版了。几乎每一部研究中国同盟会和民国初年的历史著作，都不免涉及廖仲恺这个光辉的名字。终其一生，廖仲恺都是孙中山的最可靠、最坚定的助手和战友。他翻译了许多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学论著，在《民报》和《建设杂志》上发表；他是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他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主要策划者；他是支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位出色的理财家。总之，廖仲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革命家，他担任过许多不同的职务，卓有成效地协助孙中山推进革命运动。

廖仲恺的政治信仰和孙中山的政治观点非常接近。例如，他们都坚信中国社会的发展，应该服膺于社会主义，而他俩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和理解，实质上也大同小异。廖仲恺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可能不仅局限于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而且还及于有关地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建设等主张。他的深具影响力的文章，对后者就倍加重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几个月之后，廖仲恺就被刺身死了。因此，中国和国民党便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从各方面看来，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廖仲恺是当之无愧的。

廖仲恺在风华正茂的四十七岁时，惨遭横死。他投身革命的二十个风雨春秋，正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得力辅弼，在二十年代国民党改组时期，他成为一位不可或缺的领袖群伦的人物。假如他不早殇（可惜历史不能“假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可能有不同的发展。

廖仲恺是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有关他的准确而详尽的年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必要资料。我想，从事

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感谢陈福霖、余炎光教授积二十余年对于廖仲恺生平的悉心钻研，探微索隐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祝贺他们合作撰写的《廖仲恺年谱》的问世。

史扶邻 (Harold Z. Schiffrin)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序

年谱是具有古老传统的一种史书体裁，然而人们对它的兴趣却至今历久不衰。我虽然未曾为历史人物编撰过年谱，但阅读与利用各种年谱，常感到受益匪浅。这也许是我的偏见：与其看一本平平淡淡的传记，不如看一本记事比较翔实的年谱。因为年谱至少可以使读者通过谱主历年的言行撰述，对人物有一个具体的通盘了解，甚至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难见的资料或资料线索。而一本平平淡淡的传记，读后可能毫无所得，甚至毫无印象。

当然，年谱本身也有详略、层次与格调的差异，这要取决于作者的学识素养与功力。《廖仲恺年谱》的两位作者对于谱主都有长期的研究，平素对于有关资料搜求甚勤，包括我国大陆、台湾各地收藏的文献，美、英、日等外文档案，二十年代的香港报刊，以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日、俄文著述。特别是陈福霖教授，曾多次回国专程访问廖承志、廖梦醒、廖晖、廖承麓、廖恩锡、黄雪芬等谱主亲属，并曾向邓颖超同志当面请教，都有许多难得的收获。为保存这些丰富历史资料的本来面目，这部年谱采取资料长编形式，更便于读者的检阅与利用。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促进史学界对于廖仲恺的研究。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殉难时只有48岁。从1903年正式投身革命之日起，他在二十二年间每日每时都在为民主革命英勇奋斗，直到反革命分子罪恶的子弹夺去他的生命。

更为可贵的是，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阶段，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早在《民报》时期，他已经服膺老子的主张——“正言若反”，自称：“每喜持此论以读矛盾之书”，力求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作客观的译介，以便国人进行比较抉择。他在宣传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同时，翻译介绍

了布利斯 (W.D.P.Bliss)《社会主义手册》(A Handbook of Socialism)一书中的《社会主义史大纲》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节,久津见蕨村《欧美之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无政府主义之二派》一节,以及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之第三章《革命运动之历史》(改名为《虚无党小史》)。他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先进人士之一,尽管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理解,但已明显流露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与向往。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继续追随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而奋斗,出生入死,艰苦备尝,殚精竭虑,忠诚不渝。历经讨袁、护国、护法诸役,历经一次又一次挫折与失败,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下,他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凶恶的主要敌人,而封建军阀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了反抗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必须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并且组织发动广大工农,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世界的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变化之中,孙中山号召全党:“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而廖仲恺的认识是在全党之先,思路与孙中山完全一致,他是参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实行国共合作这一重大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甚至连孙中山本人思想的转变,也显然是受到廖仲恺的影响。

1925年3月2日,廖仲恺为甘乃光《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作序(副标题是《试论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明确指出:“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的经济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依科学的组织用集合的(Collective)方法,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生产问题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是我所希望于研究社会主义一般之青年的。”这是廖仲恺晚年政治思想的高峰,也可以看作是廖仲恺离开人世以前的遗嘱,从追求建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

现在所从事的也正是孙中山、廖仲恺那一代人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廖仲恺逝世已经六十多年了，但是人们仍然铭记着他的丰功伟绩。继《双清文集》出版之后，又有《廖仲恺年谱》问世，这都是对于一代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章开沅

一九八七年春于桂子山

序

陈福霖教授从海外来信，嘱咐我在《廖仲恺年谱》前面写几句话。我虽然感到惶恐，但仍立刻答应了，因为对这部年谱的出版，我实在觉得很高兴。

年谱是人物传记的别体，但它同一般传记又有不同的特点。一般传记可以根据作者自己的写作意图，着重叙述并解剖传主生平中一些重要事件，而省略一些作者认为次要的情节，行文也比较自由，不必过分拘泥于时间的顺序。年谱就不同了，必须严格依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逐年、逐月以至逐日地记录。这样，它就有一般传记所不具备的某些优点：纵的方面，可以更细致地看到传主的思想和活动怎样一步一步发展的具体过程；横的方面，可以更容易看清传主在各个时期所面对的客观环境，看清传主一些重要思想和活动发生的前后或同时还有哪些同它有联系的事情。读者阅读一般传记时没有得到回答的一些问题，往往可以从年谱中找到答案。特别是近代的历史，时代的变化太快了。长江后浪催前浪。同样一种思想或活动，发生在这一个时候还是在那一个时候，可以起很不相同的作用或做出很不相同的解释，时间的确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因此，年谱和传记这两类体裁，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相互补充，而决不能相互替代。

年谱的编写，又是一件相当艰难而且很能显出作者功力的工作。这是因为：第一，年谱的记事在时间上要求精确，而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有时对此却讲得很含糊，有时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断定确切的时间。甚至会遇到这种情况：某一众所周知的重要事实，在一般传记中是很容易处理的，而在年谱中会连应该放在什么地方都使作者感到为难。这些，需要通过作者细心缜密的观察、比较和考证，才能获得解决。第二，年谱看起来只是以事系时，其实却必须先下一番知人论世的功夫，做到全局在

胸。这样，虽是逐年、逐月、逐日的记录，而又主次分明，前后呼应，使人读起来感到脉络清晰，井然有序，而不是一部杂乱无章的“流水帐”。这两点，做起来都是很难很难的。此中甘苦，凡是做过一点这方面工作的人，大概都会领略到。

廖仲恺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的年代，前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而又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的思想和活动，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发展几乎息息相关。出版他的年谱，其意义远不止对廖仲恺思想和生平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工作，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也将会作出重要贡献。

我同两位作者相交有年。他们两位对廖仲恺都有多年的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他们合作来编写廖仲恺年谱是很理想的。陈福霖教授来信中还告诉我：这部年谱力求集国内外史学方法的长处；采用资料长编的体裁，以保留资料的本来面目；征引的史料，包括在台湾搜集的文件，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档案，二十年代的香港报刊，国内的有关资料，并曾对廖仲恺的许多亲友作过访问。这自然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我深信，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并且会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发。

金冲及

一九八七年四月于北京

序

在传统的统治体制沉重压制下的社会里，要使一个青年人变成革命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往往会在传统体制的核心里，试图加以反抗，有的人则站在相对自由的立场上，试图与传统体制进行挑战。生于旧金山、其父去世后返回广东省故里、不久后东渡日本进入大学深造的廖仲恺，在革命家的宗谱中，应该是属于后者。倘若清末革命势力的主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海外华侨，那么，革命家廖仲恺的诞生，可以说是象征了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

廖仲恺在日本逗留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迈出了革命党员的第一步。其后，他经历了辛亥革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于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廖仲恺在这段期间的革命运动中，虽与孙中山采取同一行动，可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孙中山最亲信的人，直到他晚年进入中国国民党时代，他才成为孙中山不可或缺的战友。此事意味着革命家廖仲恺有了一段成长的过程。

作为一个革命家，廖仲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独创性的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启蒙家与实践家。他翻译介绍的欧美政治与社会思想，对国民党创造革命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实践家廖仲恺，在国民党领导群众运动、建设革命军以及促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等方面，均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廖仲恺的第二个贡献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财政家。革命运动的推进与为革命而进行的筹备资金工作，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他在国民党内是肩负起这项艰难任务的最大功臣。廖仲恺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长期的海外生活经验，外国语文的造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外认识，在促进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过程中，发挥了无比的功能。他的一生虽因惨遭暗杀而告

终，可是他的家属后继有人，继承了他的革命遗志。

关于廖仲恺的生平，需要加以解释清楚的事相当多。比如，他的生年月日、1909年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欧美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之翻译与廖仲恺政治思想的关系、同越飞的会谈与访日的意义、他对国共合作问题所处的立场以及筹备革命资金等，都是必须加以解释清楚的课题。本书对于这些问题，均一一作了解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谱不仅是记录了一个人的年表，而且是集多年研究之大成。作者陈福霖、余炎光两教授，关于廖仲恺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本书就是这种研究在目前所达到的最高成果。

山田辰雄